

国 家 重 点 图 书

20 世纪中国文学
研究丛书

Ershishiji Zhongguowenxue
Yu Yislanwenhua

20 世纪 中国文学与 伊斯兰文化

■ 马丽蓉 / 著

丛书从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视角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提供启示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国 家 重 点 图 书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Ershishiji Zhongguowenxue
Yanjiu Congshu

马丽蓉 / 著

丛书从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入手，对20世纪中国文学，并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提供启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 / 马丽蓉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12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 严家炎主编)

ISBN 7-5336-2228-6

I. 2... II. 马... III. 伊斯兰教-文化-关系-现代文学-中国-20 世纪 IV. I 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2389 号

责任编辑: 万直纯

装帧设计: 丁 明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001-2 000

定 价: 20.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2651321

邮 编: 230061

总 序

严家炎

这套“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虽然起了现在的名字，却并不想一般地研究近百年中国文学，它的重点和特色是，透过创作和理论，考察本世纪中国的文学思潮与文化思潮。

从文学史角度看，对本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思潮有两大类：一类是从近代西方传入的，另一类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衍生的。这两类思潮，情况很不相同：前者显，后者隐；前者带着强烈的近代色彩，后者则具有静谧的东方特点；前者由人们大声疾呼，自觉地倡导和传播，后者则“草色遥看近却无”，仅仅以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惯性的力量，潜在地对作家创作产生着作用。这两类思潮在具体作家身上的影响与表现形态虽然千差万别，但宏观而言，它们相互撞击，相互较量，相互错综，相互渗透，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风貌与奇异景观。

甲午战败以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把目光集中到欧美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上，想从这方面探索西方所以强

盛、中国所以贫弱的原因。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林纾、伍光建等，都是当时的代表。由他们开始，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大量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和小说、戏剧、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弥尔的自由论，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尼采的超人说，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这种种学说都蜂拥而入。在文学上，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文学，到存在主义先驱者的思想，在本世纪最初 20 年内，几乎同时都传入了中国。这些思潮在西方的出现，曾经历了 300 年左右的时间，它们是历时的，而到了中国，却在同一个早晨陈列出来，成为共时的。这就引发了种种问题。一是囫囵吞枣，消化不良，未必能准确理解原意，甚至望文生义，如鲁迅带点夸张的批评：

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①

二是实践上引起变形与扭曲，而在这些变形、扭曲背后，又存在着诸多复杂的潜在的因素。当然，许多思潮几乎同时介绍进来，也并非没有好处，这就是便于选择和比较，取自己之所需而形成不同的组合，有助于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文学流派，造成异彩纷呈的局面。然而，到 30 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传播，加上左倾思潮的盛行，一个时期重又走到

① 鲁迅：《三闲集·扁》，《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87 页。

单向发展的大一统局面。直到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才又再次实现多元开放,接上了中断几十年的那种格局。这种“之”字形的曲折道路表明:西方的种子到东方土地上,远不是都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外来思潮在中国的命运,既取决于该思潮自身的生命力,也取决于中国社会具体的条件与文学本身的需要。有的思潮即使借助于某些条件一时得势,也未必能长期站稳脚跟。从研究者来说,这就需要对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及其对文学的影响,逐一作出周密一点的考察。本丛书中的多数书稿,如吴晓东先生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徐行言、程金城先生的《表现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肖同庆先生的《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刘为民先生的《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陈顺馨女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李今女士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等,都力图这样做。

至于中国古代文化所形成的人生哲学、文学思潮、审美积淀,看来似乎不起眼,但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柔韧而又强劲的,否则就无法解释本世纪中国文学在西方强调客观写实思潮的猛烈冲击下,何以仍保持了鲜明的主体抒情格调,比兴象征传统,以及儒、释、道哲学的渗透。传统文化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造就了怎样的审美资源,较长时期内曾被人忽视。新时期以来则重新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并已有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陈平原先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方锡德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只是迄今为止这类成果似不甚多。在我们这套丛书中,谭桂林先生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等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为学者们今后继续攀登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大多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许多史料和论点还是首次运用,首次提出。作者们不尚空谈,甘坐冷板凳去查阅大量旧报刊,扎扎实实地占有原始材料,然后一点一滴地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虽然未必一定做

到了先贤们指示的“竭泽而鱼”的原则，每种著作的学术质量也未必整齐，但在当前浮躁之风日甚一日的情况下，这种治学态度毕竟相当难能可贵。如果这套丛书的出版真能对学界有所助益，那么，借此提倡一种刻苦、严谨、务实、求真的学风，也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1998年12月12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目 录

mu lu

总 序 严家炎 (1)

导 论：20世纪中国伊斯兰作家创作之我见
..... (1)

第一章：伊斯兰作家复合型文化人格 (10)

一、维、哈、回等族作家与多民族文化
的熏染 (10)

二、多种文化共同塑就的特殊人格 (10)

第二章：伊斯兰作家多元化的创作资源	(27)
一、创作资源之构成	(27)
二、创作资源的精神内质	(27)
三、创作资源的语言显示	(39)
第三章：“人性”主题的纵深开掘	(50)
一、对“人性”风俗且哲理式的表达	(50)
二、对“人性”、神性与俗性的取舍	(99)
三、对葬埋“人性”的灾难的显现	(125)
第四章：地域情结的浓情宣达	(136)
一、为草原母亲奉上的颂歌	(136)
二、对天山恋人倾诉的衷肠	(147)
第五章：高擎人文清洁大旗	(152)
一、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	(152)
二、“清洁精神”的文化质询	(152)
第六章：文化皈依中的艺术收获	(163)
一、穆斯林葬礼的出色再现	(163)
二、心灵历史的成功描摹	(175)
第七章：文学体式的有益探索（上）	(192)
一、拓展了表达空间的诗歌创作	(192)
二、显示了前卫意识的长诗探索	(237)
第八章：文学体式的有益探索（中）	(250)
一、阿凡提出场的小说叙事意义	(250)
二、意象介入的小说诗性特质	(276)

第九章：文学体式的有益探索（下）	(287)
一、“形散神不散”与“形散神聚”	(287)
二、“散文是无形式的文学”	(288)
后 记	(299)

导论：20 世纪中国伊斯兰作家 创作之我见

“伊斯兰作家”特指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作家。而伊斯兰教大约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伊历 31 年）左右从陆路和海路传入中国的。在此之前，穆罕默德就有圣训曰：“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充分表达了这位伊斯兰教创始人对中国古老文明的向往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伊斯兰教以和平和战争两种方式传入中国，但传播速度相当缓慢，并不如佛教那样一传入中国后就立即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与竭力倡导，很快便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厚佛形势。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既不对异教徒传播，也不与其他宗教比争高下，尤其不攻击儒家思想，始终未遭受过外教嫉视与攻击，以宗教文化的固有色泽平稳、持久地散落在偏远的民间、沉积于汉文化的底层。在我国 56 个民族中，就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保安族、撒拉族及东乡族等信奉伊斯兰教。其中，“就回族而言，是先有奉伊教的穆斯林，而后发展、形成为回族。保安、撒拉、东乡等族的情况亦有类似之处，即由于信奉伊教而形成民族，只不过这些民族人口较少，聚居区较集中，仍保持其固有的语言；而回族则分

布全国，人数众多，通用汉语，在诸方面各不相同而已”^①；“就新疆的维、哈等族而言，是先形成维、哈等族，而后改奉伊教。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和塔塔尔等族的情况大体类似”。^② 具体而言，“从8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又逐渐传入了哈萨克族各部”^③；从10世纪开始，维吾尔族逐步改奉伊斯兰教（参见钱伯泉编著《新疆民族史》）；从13世纪后才在我国逐渐形成了异域穆斯林与汉民族等混血相融的回族（参见林松等著《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正如周恩来总理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1957年8月4日“青岛讲话”）中所强调的：“回族是从阿拉伯、小亚细亚来的，并且时代并不太远，据说到现在不过一千多年。”可见，对维、哈族而言，是先有民族后有伊教，维吾尔族便亦农亦牧的主要聚居在新疆等地，领受到民族文化之外的伊、汉文化的外来影响。哈萨克族这个迁徙游动的民族，除受北方游牧文化影响外，也不断受到伊、汉文化的外来制约。可以说，伊、汉文化分别从宗教和时代两方面冲击着维、哈等民族的生存观；对回族而言，是先有伊教后有民族，伊教既是回族形成的坚固前提，又是回族发展的凝合剂，更是回族确证自我的基点。因此，回族始终存有可以意会、心照不宣、不易言传的共同的民族心理意识，“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也因时代变迁而由封闭走向开放，即由信教求生存（解放前）→信教、经商求生存（解放后）→信教、经商、求知谋发展（新时期），在亦农亦商地追随祖国日新

① 林松等：《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98页。

② 林松等：《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98页。

③ 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93页。

月异的时代步伐前进着。可以肯定，伊斯兰文化在回族那里，既是一种宗教文化，更是一种民族文化，这种影响因而也是根深蒂固的，所寄寓的情感更是虔诚、神圣的。最明显的佐证莫过于维、哈、回等伊斯兰作家对宗教人士的不同情感的刻画：在维、哈族作家笔下，统治阶级常常利用宗教且披着宗教的外衣来达到剥削劳动人民的阴险目的，作家便将“毛拉”（宗教人士）和“巴依”（统治者）集于一人身上，将批判与嘲讽直指政权与神权。而类似描写，在回族作家笔下却极为罕见，因为，在他们的潜念中，“阿訇”（宗教人士）原本就应该是完美人格的楷模、底层民众心灵的引路人。因此，宗教行为中的民族情感往往成为他们用来反对剥削与压迫的精神力量。可以看出：即使同样都信奉伊斯兰教，但维、哈、回等族外露的宗教情感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伊斯兰文化对维、哈、回等族的影响程度有深浅之别，亦即回族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最深，维吾尔族次之，哈萨克族更次之。若从中华民族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回族既凭借着操汉语且“大分散”的先天优势，始终置身于各民族文化之林，沉浮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以开放、主动的姿态汲取着除伊斯兰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的滋养。同时又因“小聚居”而执著、持久地葆有伊斯兰文化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族在旅途”的特有度世方式，更源自阿拉伯祖先驼背文化的深远影响。“断了归所”的漫漫长旅，令回民不得不感到“路上更觉故乡遥远”，但“终日只渴望走”，因为自己“最想的还是流浪”。显然，这颗“不安的旅人之魂”是祖先造就的。一代代回民的“on the road”，便在他们身上鲜明地体现出以“路”为本色的“路文化”，这和以“家”为底色的中国传统“家文化”形成了比照与互补。因此，较之维、哈族作家，回族作家创作本身就更具文化的典型意义。因为他们的创作实际就是操汉语进行的一项伊、汉文化相撞互融的精神劳作。甚至可以说，维、哈族作家的创作更具异

族异域性地填补民族文学题材空白的意义，而回族作家的创作则更具中外文化联姻结亲的参考价值。当然，异质文化的接触过程充满曲折与复杂，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人身上都反映出不同的情形，仅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大体就有三类情形：一类是以翦伯赞和沙陆墟为代表的被汉化现象：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是那支曾被皇上赐为翦姓且生息在湖南的维吾尔族的后代，一生致力于历史学的研究，他的那篇《内蒙访古》更是家喻户晓。以高龄、高产又善通俗小说创作而闻名文坛的沙陆墟老人是“祖籍肃州西”的回族，一直生活在江南汉文化氛围中，人称他的作品是“江南社会生活的风俗画”。不论是治史料研究的维吾尔族翦伯赞，还是攻历史通俗小说创作的回族沙陆墟，两人殊途同归般的“趋史”之举恐怕不能单以“文史不分家”来论处，更应该视为他们内心深处久埋秘存的寻根问祖情结的某种曲变。正如沙老晚年在他乡异地反复吟诵故乡与血脉那样：

日夜思宁夏，
魂萦非一般；
体衰年耄耋，
对月泪潸潸。

——《思乡百字吟》

老夫回族裔，
岂能忘祖先？

——《望故乡》

因此，翦、沙现象说明：散落于浓厚汉文化生存空间里的维、回等族信仰伊教的民族学者和作家，如何以特有的心理、眼光审视源远流长的汉民族文化的？在汉民族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内地伊斯兰学者、作家又如何将多民族的文化相结

合的？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度里多民族的文学艺术是怎样相互交流、互为影响的？可以说，他们是被汉化了、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出的独特的中国文化人。因此，他们便能站在特殊的视角更多地研究并表现本民族文化之外的东西。研究空间与创作空间的扩延本身就是他们创造的一种奇迹。这绝不能用民族作家（学者）的非民族化来武断作结；如果说，翦、沙的被汉化促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的话，那么，在霍达和马瑞芳这里则呈现出被同化与寻回归的循环往复式的精神苦旅：霍达力求为现实生活中处伊、汉文化夹缝中尴尬求生的兄弟姐妹们寻一条突围之路。马瑞芳索性用“第三只眼睛”游刃有余地剖析着学院内外各色儒士们鲜为人知的灵魂。亦史亦文的宏阔视野与强健笔力使她们在伊、汉两种文化之间往来穿行，承领两种文化的强度辉照，她们常常在罗织故事和塑造人物时，陷入事件纠葛、沉于人物喜怒，令人难分彼此。因此，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便一并在理智与情感、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等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苦苦挣扎；张承志和王延辉则既不同于翦、沙的被汉化，也不同于霍、马的被伊、汉文化所囿限，而是历经被汉化后寻到了回归之路，之后又能跳出伊、汉文化之束缚，程度不同地踩在多片文化上进行创作（张承志尤其如此）。尽管他们仍旧操汉语在进行创作，但“皈依母族”对他们的人生与创作均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他们便置身于丰厚的文化资源上反观伊、汉文化，逐步感到汉字已很难负载他们越来越丰富厚重的文化信息了，于是，张承志的弃文从画、王延辉的语言音乐化都隐显不同地表明他们试图要寻找一种更新、更阔、更适于自我表达的文化媒体与文字符码的某种努力。可见，这三种不同的文化现象较为清晰地向我们显示出：伊斯兰作家如何一步步接受汉文化，摆脱被动汉化，利用伊、汉文化之优长，最后终于拥有了伊、汉文化之外更为多元的文化资源的艰辛坎坷之路。他们的文化成长之路便如此顺理成章地和

他们的文学成熟之路暗合且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这个话题本身就涵盖了文化和文学的双重意义，伊斯兰作家的创作也便肩负了文学之外的文化使命了。不仅如此，伊斯兰作家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民间文化的宣达者与底层情绪的表达人。在民间理论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著名学者陈思和先生看来，“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首先，它“是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一个生活世界”，“尽管民间是一个弱势的生活形态，但毕竟有其相对独立相对稳固的历史，因而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主流文化所接纳，并且深深地渗透其中”；其次，“自由自在是它的基本美学风格。民间是人的自由人性永恒的来源”；最后，“民间既然具有自己的哲学、宗教、文艺和习俗传统”，那么“必然是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并存”。^① 因此，伊斯兰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民间文化：它长期散落、沉淀在穆斯林聚居的偏远地区、时隐时现地渗透于汉文化之中，始终高擎心灵自由的人性大旗，以宗教文化的形态进入穆斯林的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以强大包容力和瑕瑜互见的野性美而为广大的底层民众信奉并恪守。可见，作为民间、底层的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而陈思和先生更是强调民间文化是“‘五四’以来文化的三分天下‘格局’”^② 中最应加强研究的一方面：

研究现当代文化演进的历史时，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本世纪几乎每一个政治文化阶段和空间，无不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和民间生活

① 陈思和等：《理解 90 年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 7 月版，第 170、171 页。

② 陈思和等：《理解 90 年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 7 月版，第 169 页。

世界及民间文化形态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这个三角关系中的前面两项，是学术界经常讨论的话题……第三项即民间的存在以往注意得很不够。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得到加强。而且，不了解民间因素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我所说的文化的“三分天下”。

——《理解 90 年代》

显然，不理解伊斯兰文化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中的特殊意义，就无法全面展示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复杂、生动的全貌。

可否如此断言：对维、哈、回等族作家而言，伊斯兰文化不仅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背景和资源，更为他们的思考开阔了眼界与胸襟。伊斯兰作家的创作不仅在文化史上极具个案分析的价值，而且在文学史上，尤其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填补了民间文学的某种空白，更强调了民间文化对人性的深刻铸塑作用。

尤需强调的是，伊斯兰文化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情形既不同于佛教文化，也不同于基督教文化；就影响程度而言，也是因族而异、因地有别的。亦即，伊斯兰文化对回族作家创作的影响远甚于维、哈等族作家；伊斯兰文化对维、哈、回族聚居区生长的作家的影响重于非聚居区的作家。因此可以肯定：回族作家的创作较之维、哈等族作家的创作更能体现“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无论如何，回族作家的创作更具例证意味，更能直接、典型地界说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相糅互补的亲疏关系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该打破研究此类课题上惯有的思维误区：按民族平均主义地分配作家名额，按时段隔靴搔痒地罗列作家创作。为了更清楚地阐释伊斯兰作家的创作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独有生存价值，我们就应该以开放、豁